

## 深切缅怀丁声树先生

石 明 远

丁声树先生 1909 年 3 月 9 日出生,今年是他诞辰九十周年。他是我国语言学界的一代宗师,更是我个人的良师益友。十年前,丁先生久卧病榻之后,遽归道山,但他的音容笑貌、学者风范却永远留在我的脑海里。每当念及,我就魂牵梦绕而泪眼涔涔。丁公的学问造诣极深,我不敢妄加评论,但相处多年,就耳听目见,缕述几事,以表怀念。

1957 年春我到语言所工作,所长罗常培每逢茶余饭后与我漫步花径路边,向我介绍语言所的情况,介绍丁公时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。说在北大中文系学习时,师从国学大师钱玄同、沈尹默。都知道钱先生对学生判分是极严格的,而丁先生的毕业论文,竟得了 100 分,一时全校轰动,出了个大一百是河南人丁声树。丁公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,初去是助理,默默无闻的看书,从不率而为文,掌握了充足的资料,才肯下笔。后来他在《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》上发表了《释否定词“弗”“不”》,引据充分,论证严密,无懈可击。这时丁公还不到三十岁。丁公因此极受所长傅斯年赏识,一般在学刊发表文章,只给抽印本 20 份,没有稿费,这次破例给稿费大洋二百元。一时誉满全所。他的同仁胡适之先生看到丁公的文章后,评价也很高,说“真是巨眼,佩服,佩服”。

我在办公室常接到向丁公请教的电话,他多半是随问随答,试举两例如下:(一)“文化革命”前彭真市长的秘书程湘清一次来电话说,在起草文件时遇到“取法於上,仅得其中”,问出于何处,丁公立即告诉他出《资治通鉴》贞观二十二年,上作《帝范》十二篇以赐太子,说到这个话。(二)是叶剑英元帅《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的讲话》里两个成语:“艰难困苦,玉汝于成”。还有“山重水复疑无路,柳暗花明又一村”。请教到了丁公处,立即作了答复。前一条典出于北宋哲学家张载《西镜》,原话是“富贵福泽,将厚吾之生也;贫贱忧戚,庸玉汝于成也”。后一条出自南宋诗人陆游一首七律《游山西村》,后来成了人们习用的成语。我用铅笔抄在 1979 年 7 月 29 日在人民大会堂听报告时发的本子上。新华社发布的电讯稿里有这两条成语的注释。后来看到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正式文本里也有这两条成语的注释。

丁公的道德文章在史语所时就出了名,后来我去尹达家(从五七干校回来),还有周祖谟先生在丁声树先生的追思会上,都到了丁公的雅号是丁圣人。

语言研究所方言室、词典室的年轻人以及所里其他许多人都受到丁公的培养,或讲音韵,或讲训诂,或讲勾词(讨论书籍报刊上什么词可勾),字写得潦草的,请他练字。丁公自己在星期天、节假日也勾词,抄卡片,起了示范作用。丁公循循然善诱人。我跟他一起多年,受到他的教益就很多。1958 年语言所搬到西城端王府后,有一次他对我说,你的方言很有特点,可以记记。后来送我《韵镜》,说实在的,这本书说内、外转等等我看不懂。后来又送我史语所有他文章的集刊,还有用来记录方言的《方言调查字表》,以及《古今字音对照手册》,语音班的音韵讲

义油印本等。经丁公对我不断启发、指导,我逐渐地领悟到莒县[tθ tθ' θ]和[tʂ tʂ' ʂ]这两组声母是有规律可循的,从而使我萌发了记录莒县方言的兴趣。我后来写《莒县方言志》,最早便是得益于丁公的指导。丁公几十年来在方言室、词典室殚精竭虑,无微不至,培养了一代新人,作为骨干力量,使工作后继有人。正如唐刘禹锡诗所咏:芳林新叶催旧叶,流水前波让后波。这是历史的规律。

丁公夫妇俩都是高级研究人员,月收入五、六百元,在那个年代算是收入颇丰了。但他却过着极为俭朴的生活。丁公布衣布鞋,戴着个帽罩折断了的解放帽子,衣着从不讲究。从穿戴上看不出是位大学者的样子。生活上严格要求自己,从不特殊。三年困难时,国务院发给他一张优待证,有肉、蛋、糖、豆、香烟等,每月买一次。丁公把这张供应证放在办公室抽屉里,一直没有使用。我多次劝说,请他拿去改善一下生活,无论如何也不行。一天下雪,下午说好明天用汽车去接他上班,汽车开去时,他早走了。1956年丁先生在和平里的语音班讲课,有一次通知他去中关村开会,语音班给雇了车送他,他给司机付了钱请他回去,和大家一道坐公共汽车来开会,特殊的事怎么也不干。在河南五七干校分配烧开水,锅炉烧煤,老是站着调理,以增加火势,腿肿得发亮,被卫生员看见了,他说千万不要告诉军宣队,让他休息。他早就有高血压,一天我去三里河送孩子,看到他在一家药房里买降压药,不去医院,怕所里知道他患病让他休息。上班吃食堂自己排队打饭,买一个素菜,分一半给同桌的年轻人,另一半再用水滤一滤,怕咸,将其冲淡,自己将就着吃。

1965年建外永安南里七、八号高研楼落成。当时的哲学社会科学部要分给丁公一套,但他无论如何不搬,说三里河的两间一套就很好了,三楼又给一间可以当书房。丁公书多,自己住的一小间,除一张床和一张小桌外,全是线装书。尽管住在这样狭小房间里,也不去五间一套的单元里,为了一个宗旨——不特殊。

每遇国家有困难、天灾,研究所里有困难户,丁公总是慷慨解囊相助。抗美援朝时他不在所里捐而是去银行,数目比一般人多,怕张榜表扬;邢台地震他在办公室打听到邢台地区募捐办事处在什么地方,于是收集了家中衣物雇三辆三轮车送去;1963年河北水灾时除捐献衣物外,还买了数条灰色棉毯捐上。所里有困难的同志多半向他借过钱,如炊事员小张,上有父辈,下有三个孩子,爱人不工作,靠自己微薄的工资,生活非常困难,我知道丁公就经常接济他。

丁公是1964年6月光荣参加中国共产党的。他入党后组织观念特别强。党小组长是个女孩子资料员,在小组会上丁公主动汇报思想,说党内没有特殊党员。他处处起模范作用,如请他担任中国语文主编,后来又担任词典室主任都愉快的接受了。不论作什么工作,都是全力以赴,没有星期天,没有节假日。像丁公这样勤勤恳恳,一心扑在工作上面的学者,说起来实在太令人感动了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时丁公也在劫难逃。大字报铺天盖地,把他打成反动权威,挂黑牌,戴高帽,开批判会,劳动改造。我很担心他承受不了这种种人格的污辱。有一次我们这些人被集中在一个大办公室里住宿,夜里我俩一道去厕所,在路上,丁公笑着说:我们真的实行三同了,同吃、同住、同劳动(不准回家)。看他的样子,我放心了,他是经得起风雨的。

在纪念丁公九十冥诞,逝世十周年之际,我深切缅怀丁公的敦厚、谦和、诚笃,毕生以他的学问惠及后生,功德无量,谨以此文为祭。

(本文责任编辑 李 蓝)

[石明远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100732]